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一期
2007 年 12 月　頁 41-68

超越民族國家
濱下武志對當代中國研究的
知識啟示*

陳威志**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感謝匿名審稿人之寶貴意見。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要

論者在從事以社會科學理論適用於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同時，必須回到「中國」自身是否可以滿足理論前提。政治科學理論的知識前提是以國家作為研究對象，此前提自西發利亞條約所創之體系成立迄今，已具備了不証自明的某種類科學性質。本文目的在反對有關民族國家之假設所帶有的目的論，探討政治敘事與政治現實間之關係，並以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中國研究成果為據，透過對中國作為朝貢體秩序的省思，建議從事中國研究之論者另一個認識中國的途徑，進而回溯中國作為今日國家概念前，並非如政治科學所言是一種國家治理關係。

關鍵詞：中國、知識論、敘事、政治現實、朝貢貿易體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中國研究的學者在面對中國時，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即是，中國（China）究竟算不算是一個國家[1]？在政治學中這幾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命題[2]，因為政治學研究的範疇都把國家視為一個單元，而國家作為分析單元的發展在晚近根據一九三三年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規定，其要件包括：永久性人口（permanent population）、確定界限之領土（defined territory）、政府（government）、與其他國家之交往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3]。研究者將「中國」做為分析單元時必然將上述要件視為當然，但對政治學而言，只假設中國作為國家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不處理中國究竟是什麼的問題。

把中國視為先驗存在的系譜可從今日學院裡將政治學一分為三的趨勢來看，政治理論與哲學要回答的大抵是何謂國家主權以及如何擴大其影響的問題[4]，柏丹（Jean Bodin）在歐洲政治思想史上最大的成就在於出版了《國家論》[5]一書，因為該書作於聖巴托羅繆屠殺（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s Day）的四年之後，因此這本政治思想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主旨在於要求國家必須負起管理的責任，而為管理所需要的權力稱為主權，柏丹認為沒有主權就沒有安定[6]，對他而言，主權的唯一體現者就是

1 提出這個批判的包括國內學者，石之瑜，《政治學的知識脈絡》，臺北市，五南，民 90。
2 William E. Connolly, "Tocqueville, Territory and Violenc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I I*(1994), pp.19-42.
3 該公約第一條。
4 Scott Gordon, *Controlling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four chapters from six books on the commonwealth,*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lian H. Frankl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6 Phyllis Doyl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 t*(London: Jonathan Cape, 1963), pp.43-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國國王，根據其自然法理論，柏丹的體系包含憲政主義和中央集權[7]。至於國際政治與比較政治研究更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一般咸認近代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對象出現於一六四八年西發利亞合約之後[8]，亦即民族國家，比柏丹的國家（State）還多出一層民族（Nation）的意義。關於民族，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是一種被想像為擁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9]；史密斯（Anthony Smith）以給定某種共有稱謂的方式定義民族[10]；葛爾納（Ernest Gellner）認為民族存在於一種政治、文化、心理重合邊界之內[11]，國際政治理論所理解的衝突甚多出現在民族國家合一的理想化概念中。公共行政領域將國家視為提供公共服務之行為者，凡親族或市場不能提供社會所需，由國家單位來計劃、生產和提供服務，即使有論者認為國家只應扮演最基本的角色也同意政府需要介入，例如國防和維持治安，在分配資源和服務方面，政府有道德上的責任來確保平等。[12]。

---

7 George Holland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1).

8 當然這還尚有爭議，除以西發利亞為分水嶺外，亦有論者認為在十五世紀後期，當時歐洲已經出現封建秩序之衰敗，從而形成約莫五百多個獨立的政治單位，尤其是一些擁有完善行政體系與外交機構的北義大利城市國家，其政治實體的獨立性不言而喻。Garrett Mattingly, *Renaissance Diplomacy* (Dover Publications, 1988). 也有人認為是從 1555 年結束了天主教和新教各邦諸侯之間的戰爭的奧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開始，因該和約制定了教隨國定的原則，承認各邦諸侯有權自由選定其自身及其臣民信仰天主教或路德教派，和約還規定 1552 年前新教諸侯佔有的天主教會土地和沒收的天主教會財產不再歸還。“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The Peace of Augsburg 1555: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Between Thomas A. Brady, Euan Cameron and Henry Cohn,” *German History*, Volume 24, Number 1, (January 2006), pp. 85-105 (21).

9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市，時報文化，民 88。

10 例如群體共用的神話，具體而言如中國人作為群體以黃帝為神話形成連結。Anthony D. Smith, *The antiquity of nation*s (Malden, MA, USA: Polity, 2004).

11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 如由市場主導，就會摧毀公共服務的道德理念，大體來說因為有四種情形而使國家不能過度依賴市場：公共財的提供、經濟效益、外部性（externalities）、殊價財（merit goods）。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述政治學中以民族國家為前提進行研究，是一種特定政治主張[13]，正如傅科所言：「地圖上的國界只是政治權力的領屬空間，而作為政治領屬空間的國界也不過就是地圖上的國界[14]」誠然，民族國家的界線是根據歐洲近代化後所逐漸構築起來的[15]，是否能把同一性（oneness）普遍適用，值得爭辯。在中國研究中，關於中國是否具有內在同一性，在區域史學的研究上就曾經引起討論。早期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所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中非常強調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16]，並形成了所謂中國研究的施堅雅模式。該模式包括集市體系理論和區域體系理論，前者主要研究中國鄉村社會，以《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17]為代表。後者主要研究中國城市化，以《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為代表。施堅雅的區域體系理論是集市體系理論的拓展和深化，兩者均以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地學說為主要研究方法，同時吸納了美國社會學家羅茲曼（Glbert Rozman）的城市空間網路學說、美國地理學家濟弗（George K. Zipf）的等級——規模學說，以及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而後許多中國研究學者如 Robert Hartwell[18]、Robert Hymes[19]、Richard Von Glahn[20]、Richard Davis[21]、Peter Bol[22]等便在這個基礎上對中國進行各自理解。

---

13 石之瑜，《政治學的知識脈絡》，頁 7。

14 Mark Cousins 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5 比如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已經注意到這「是源於特定地域及時空環境下的歷史產物」，所以在討論到民族國家的語言問題時，他也說到「不過中國的情況是一大例外」。霍布斯邦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臺北：麥田出版，1997 年，頁 8、75。

16 施堅雅把帝制中國分為九個地區以暗示著同地區分別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不能以「中國」的概括性詞彙來描述。施堅雅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242-252。

17 施堅雅著，史建雲、徐秀麗譯，《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8 年。

18 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 pp.365-442.

19 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0 Richard Von Glahn, “Municipal Reform and Urban Social Conflict in Late M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對於歐美的中國學研究者以「區域化」研究方法解構中國的同一性，日本的中國學研究者則多以民族研究（study of ethnology）途徑達到解構目的。矢野仁一在戰前曾出版《近代支那論》，其中有〈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篇，認為中國不能被視為民族國家，文中認為有許多民族（如滿、蒙、藏）既非中國之領土，若要維持民族國家的同一性，根本不是推翻清朝，而是建立民族國家，從而中國應放棄控制疆地[23]。長久以來，日本對中國的認識與其對亞洲的認識相互牽連[24]，近來許多亞洲學者紛紛重提「亞洲」概念以重新構築一個以資抵擋西方話語霸權的政治空間[25]，其目的在於檢討以民族國家當作研究「中國」的範式，並嘗試推翻採取民族主義史觀的本國史。

在美國，中國研究所面臨的知識挑戰是從歐洲中心與中國中心的相應所展開的對立[26]，後來則是歐美研究者因為來自中國的被研究者加入中國研究社群，對自己置身事外的客觀性產生動搖[27]，就連中國中心的主張也難以為繼。本文以下首先針對中國的概念是如何透過敘事被建構出來的，再續以一種經濟史的研究範式，介紹中國可以在政治學研究的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2 (1991).

[21] Richard L. Davis,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42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2] Peter Bol,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ion in Southern Song Statecraft", presented for Program for the Academia Sinica'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2000/6/29-7/1).

[23]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東京，弘文堂書房，1923 年。不過矢野的寫作意識並非在於提供新的中國認識論，而是服務於日本對中國的佔領。

[24] 有關日本亞洲認識的淵源，參見石之瑜，〈アヅアに戻るのか？日本の中国勃興認識における思想的基礎〉，佐藤東洋士、李恩民編，《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可能性——日中関係の再検討》，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6 年；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4 期，2006 年；葛兆光，〈想像的還是實際的：誰認同亞洲？〉，《台大歷史學報》，第 30 期，2002 年。

[25]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台灣社會研究書系，2006 年，頁 337-418。

[26] 相應意在包含相對與相同，在這個辯論中最有衝擊力的便屬 Paul Cohen 的批判。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 石之瑜，〈知識觀光：中國研究的知識倫理框架〉，《社會科學》，第 2 期，2006 年，頁 166-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提之外如何進行理解，最後建議中國研究可以透過不同的論述空間並且針對論者自身的發聲位置（enunciative positionality）從而不再侷限於某種主張普遍性的知識。

貳、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敘事開展

研究者針對知識性質進行反思，通常透過方法論的進步以達到研究成果的突破[28]，反思的目的固然在於「去」掉任何先驗的存在[29]，但在政治學門中，研究者反思的卻常是層次限於方法論，而忽略知識論層次的悖論[30]。知識的發展乃與時俱進，今日被接受的基本前提亦有其歷史淵源而非神來之筆，在討論中國如何被概念化成為政治學的研究單位之前，本文亦須先行討論「中國」此一研究對象在被視為民族國家時，背後形成之動力何以不是一種基於政治現實狀態的再現，而是一種政治學的敘事？

根據 G. Prince，敘事是「一種在時間序列中至少有兩個真實或虛構的事件或情狀之再現，其中任一個皆不可對另者形成前提或是限制[31]」。

---

[28] 即為何種方法可以成功地使某一種理論成立或被否證，且使典範進步或退步。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59), p.18；陳宏銘，〈現實主義典範的進步或退化：以 Vasquez 採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的論戰為焦點〉，《東吳政治學報》，第 17 期，2003 年，頁 53-91。

[29] 極激烈者如 Sandra Harding 的 standpoint theory，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形成自己的歷史唯物論，討論因為物質結構所影響的人如何對社會進行理解，以及不同的結構位置造成了不同立場（standpoint），其解決方案則是透過承諾與鬥爭進行社會中角色的去殖民。Nancy C. M. Hartsock,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andra Harding ed., *Feminism &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哈定（Sandra Harding）著，江珍賢譯，〈女性主義、科學與反啟蒙批評〉，《島嶼邊緣》，第二期，1992 年。

[30] 知識論思維在 Hetherington 看來都會陷入一種不可能的窘境，因為知識論有自我限制與自我優先的能力（或是缺失），因此必然產生矛盾或是悖論。Stephen Cade Hetherington, *Epistemology's Paradox: Is a Theory of Knowledge Possibl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1991).

[31] 這類根據結構條件所定義的方式會對其本身創造出不少探討敘事到底是什麼的話語空間。G. Prince, *Narratology* (Berlin: Mouton, 1982), p.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政治敘事所指，不但包括出自於正式的政治場域，如國會、國家領導人談話、政黨會議、政治示威等，也包括任何具有政治目的之敘事，[32]甚或任何產生政治效果的敘事或不敘事。因此，在討論政治敘事時，論者幾乎可以確定其帶有一種特定立場，即便論者可以爭辯在敘事過程中可以極為精確地描繪並記敘事件的序列，但在敘事之前作為選擇敘事事件的觀念已帶有特定的觀點。而透過數種不同觀點與立場所構築的敘事架構在科學主義者的想法裡可能具有客觀性，但在這個敘事架構後面則存在一樣的選擇性過程——構成此架構的目的與假設本身就需要研究者選定？再進一步推論，又即便某種敘事架構被接受為客觀，研究者是否可以全然理解該架構中的立場，這牽涉到人類心理的內在性，在接受概念的過程中是否可以全然理解並且神入（empathize）該立場。

敘事究竟是被創造出來以某種模式加諸於現實之上，抑或現實自身被形塑成為一種敘事？因此政治敘事與政治現實之間除了在認識論上有所分別之外，因為上述的問題而使得在方法論上也出現不同說法。[33]其中一類說法把政治敘事與政治現實當作一種相互攝取（mutual ingestion）的結果，心理學研究者如布魯納（Jerome Bruner）[34]或是鑽研詮釋學的

[32] Shenhav 在他的研究當中以前者為主，但本文認為後者雖然可以發展為幾乎指涉任何敘事，但也因為後者的開放性使得討論「政治的」成為可能，又因為前者必然會牽涉到政治本身在意義上之爭辯。Shaul R. Shenhav, “Thin and Thick Narrative Analysis,” *Narrative Inquiry* 15 (1) (2005), pp.75-99。

[33] 有一說認為現實與敘事一樣都是根據時間先後軸線所形成的前後關係結構，因此敘事可被視為現實之反射，但在今日科學懷疑論下此說必然被認為過於天真，因此政治敘事在此說之下更是難以為繼。另一種途徑把敘事視為人類因處理非敘事的現實而產生的解決方案與動態，懷特（Hayden White）便認為人類有隱含的欲望以敘事方法將現實以一貫與賦予意義的方式進行處理，根據他的說法，將敘事結構強加在現實之上是一種事件的「道德化」（moralization）。Y. Enzhari, *The Descent of Icaru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72-275；P.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 by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Hayden White, “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J.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34] Bruner 曾經說過「敘事仿造生活，生活仿造敘事」一語。J.S. Bruner,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 (1), pp.1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iddershoven[35]都認為敘事與現實之間不應該只具備單向的存有關係，而是著重在兩者間攝取的動態，在這裡敘事便不是現實的鏡子，而可以透過交互作用改變現實與自我修正。

政治敘事與政治現實的互動關係，釐清何以中國研究是以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為前提假設。當代政治學議程上主要的中國問題在於中國如何現代化，這似乎對中國研究者來說至為重要，是中國進入政治學中最重主要的步驟。近代與現代的意義在於與過去切割，不少研究者關心，中國今後要以何種共同體觀念來締造自己的民族與國家[36]，卻跳過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中國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了嗎[37]？

在中國成為研究對象之前，牽連著一個更大的概念——亞洲。在歐洲進入啟蒙時期之前，亞洲並不具有意義，充其量是一種非西方的模糊存在，正如馬場公彥所說：

> ……東方「日出處」的亞細亞這一未為人所知的東方世界，只是由西方人外在命名的一個稱呼。始於 15 世紀西方（the West）殖民統治非西方（the Rest）的西力東漸浪潮……[38]

在啟蒙時期以及殖民運動開始後，亞洲概念開始碎裂化，逐漸成為與歐洲對照的另一種他者身分，如單一民族國家與多民族國家、近代司法體

---

35 Widdershoven 在其對歷史的哲學爭辯中認為生活的經驗同時創造了敘事且受其形塑。G.A.M. Widdershoven, “The Story of Life: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Social Research* 54(1), pp.6-9。

36 許紀霖，〈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現代中國兩種民族國家認同觀〉，發表於「現代性之政治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民國 94 年 12 月 6 日）。

37 王爾敏對「中國」此辭彙有深入的歷史淵源探究。參見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1976 年，頁 447-466。方維規也曾經撰文認為中國不甚符合西方近代對於民族國家的理論。參見方維規，〈論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與「中國」〉，《二十一世紀》，總第 3 期，2002 年 6 月號。

38 馬場公彥著，石井剛譯，〈後冷戰時期「東亞」論述的視域——走向開放性區域主義的幾個嘗試〉，《開放時代》，2004 年 3 月。日本漢學家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在約莫半個世紀之前即提出此類看法，他認為亞洲或是中國——即馬場所言 the rest——的自我意識發現始於「西方」的戰爭失敗之後開始。參見竹內好，〈中國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竹內好著，《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93，頁 1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與政治專制等，這種對照在黑格爾的論述中十分清楚地被指出來。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以哲學歷史的方式論證絕對精神發展史，黑氏認為需要歷史的地理基礎，並以地理學的形式將時間建構為空間[39]。絕對精神的發展穿越了四個大的歷史階段，即包括中國、印度和波斯等在內的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和代表著現代世界精神的日爾曼世界。黑格爾將世界歷史的各個時期比作人生中的各個時期，因為人生各個時期所具有的理性是互不相同的：東亞文化是孩童時代、中亞文化為少年時代、希臘文化為青年時代、羅馬文化為壯年時代，而日爾曼世界的文化理所當然屬於老年時代，黑格爾的世界歷史依照空間概念從東方成長到西方，並以生命歷程為喻。

另外還有一些當時的知識份子對中國開始進行一種概念挪用（appropriation）[40]。如 16 世紀進入中國的利瑪竇就把孔子的道德學說譯成 philosophy，並指出：「中國哲學家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這位博學的偉大人物誕生於基督紀元前五百五十年，享年七十餘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41]」笛卡爾學派的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寫了一篇「一位基督教哲學家與一位中國哲學家的對話」，使用了 philosophy 來指稱中國的易學和朱熹的理學。至於伏爾泰、萊布尼茨等人更是對中國的 philosophy 讚不絕口，萊布尼茨說：「在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有一個極其令人贊佩的道德……這種哲學學說或自然神論是從約三千年以來建立起來的，並且富有權威，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42]」

---

[39]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頁 85。
[40] Homi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October, Vol. 28, Discipleship: A Special Issue on Psychoanalysis (Spring, 1984), pp. 125-133.
[41]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31。
[42] 黑格爾等著，何兆武、柳卸林主編，《中國印象——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爾後此類不論是相對化或是某種怪異的「矛盾的擬態」（ambivalence of mimicry）[43]，所謂「西方」便以這兩條理路對中國進行認識，布魯（Gregory Blue）曾經評論「西方」在面對中國文明與自身比較時的系絡，而這種變遷的方向在其著作中更被細分為：中古與文藝復興時期的「驚異艷羨」（wonder）、十七與早期啟蒙時代的「意見雜陳」（mixed opinions）、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文化聲名江河日下」（the decline of China's cultural reputation）、後啟蒙時代「種族恐華症」（racialist sinophobia）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遠景」（new vistas）[44]。儼然，中國對前述的思想家或學者來說並無主體，而只是一種在其語境下滿足自身目的論的實驗場域。但此類對於中國文明的認識與反思很少進入政治學的討論，政治學對於中國的討論因為知識論的因素在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將之化約為學科中的基本民族國家假設。

直到十九、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開始，中國跟隨著亞洲的變動開始被賦予另一種意義，而這種新的意義可以從亞洲針對歐洲「東方主義」所製造的另一種東方主義談起[45]。十九世紀的亞洲以日本為主出現所謂「興亞」、「脫亞」之爭辯，以福澤諭吉為主的脫亞論主張西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型態，並以其為標準，將當時的世界劃分為開化、半開化與野蠻三種類型[46]。他在所著《文明論之概略》中指出：「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

---

[43]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85-92.

[44] 邱澎生，〈如何審視鏡像中國？評介「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台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2004 年 6 月，頁 443-455。

[45] 孫歌認為亞洲自己有一種「東方主義」，是與 Edward Said 所批判的東方主義不同，因為「亞洲的東方主義是針對亞洲的西方主義而發的」，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東方也必需處理亞洲概念的問題，只是與歐洲處理的方式不同。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臺北，巨流，2001 年，頁 24。

[46] 福澤在對西洋文明十分推崇的同時，也看到了這一先進文明所具有的攻擊性質。且以印度、中國為殷鑒，意識到了日本所處的危險境地。而他的策略就是日本要從內外兩方面向文明進軍，從而達到保持國家獨立的目的。因而福澤在堅決摒棄儒教的同時，也要與儒教的宗主國——中國，以及朝鮮這些東方的「惡鄰」徹底告別，而與西方文明之國共進退，也就是所謂的「脫亞入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進一步認為脫離亞洲的落後「是人類的必經的階段，也可以說是文明發展的過程[47]」。

興亞論者的亞洲認識則衍生自東洋與西洋的文明兩極觀。早期的興亞論具有相當強的同盟意識，在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提出理想型亞洲主義，並主張日本與朝鮮應該合為一邦且與中國結盟，以對於白種人進行人種競爭之後[48]，日本思想家從同盟式的亞洲主義轉為文化式的亞洲主義討論[49]，代表者如三宅雪嶺、岡倉天心、井上哲次郎、井上圓了等人。上述不論是興亞還是脫亞，皆隱隱與更早的歐洲經驗相符，福澤諭吉在論述中先確定以文明區分時西方文明的優勢，次之再以劣等亞洲「文明」中，日本將可隨明治維新成為新國，故應該擺脫其「亞細亞之惡友」為敘事策略。不論福澤的論述在後來究竟是不是日本為了成為歐洲而不得不殖民亞洲的理據，不過福澤的邏輯的確強勢地將日、中、韓以西方的近代標準劃歸為民族國家，並且成功地將中國華夷秩序中「華」的地位轉換到日本的身分中[50]。再以岡倉天心為例，雖然岡倉所提亞洲一體（Asia as One）與福澤相反且看來很有超國家的意味，但如果再細究岡倉的思想會發現亦非全然如此。岡倉生於橫濱，乃是十九世紀外國人聚集之地，在他擔任波士頓美術館東方部主任時出版著作如英語的《東洋的理想》[51]、《說茶》[52]等，早期政治學界、文化研究界甚至亞洲研究界對岡倉《東洋的理想》一書並不陌生，但卻少見與《說茶》一書的對話。該書不啻為討論茶道的至品，在煎茶、抹茶和淹茶之外，岡倉透過茶道批評西方的國家物質主義並受到西方的關注，並反過來肯定自我的

[47] 許介鱗，〈福澤諭吉的文明觀與脫亞論〉，《歷史月刊》，2003 年 5 月，頁 34-43；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年，頁 9。
[48]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975 年。
[49] 此年代約為一八八〇年代之後，出現轉變的原因在於日本國內自由民權運動轉弱，國內歐化思潮氾濫，被稱為「鹿鳴館時代」。部分知識分子希望振興亞洲文化與日本文化的獨立性。
[50] 呂理州，《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臺北市，遠流，民 82。
[51] 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東京，創元社，昭和 14 年。
[52] 岡倉天心著，張喚民譯，《說茶》，天津市，百花文藝，2003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學觀。岡倉預設的是想透過「茶」為發聲位置，藉以反襯西方的精神空虛與破壞性，其設想茶道是亞洲可共通的語言，不過從其字裡行間中仍能理解岡倉所謂的東西之分，根本上還是立足於某個預設的日本民族位置上。岡倉宣稱欲促成東西的交往並相互拋棄成見，但就如戶川愛對《說茶》一書的討論中所言可知，岡倉畢竟還是為了日本民族企圖與中國民族徹底切割而發聲：

> ……《說茶》的本意是向西方人提出他們所未知的東方日本的生活藝術以及審美觀……此書給予日本人的啟發和鼓勵遠遠超過了作者的本意……天心一百年前渴望向西方傳達的亞洲日本的優秀文化……[53]

中國的知識份子在面對十九世紀的遽變時又是如何自處？如何投入國族生產的事業中？如何「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54]？因研究限度本文僅以孫中山為例。孫中山的亞洲主義在學界已有眾多的研究[55]，但好像少有人感覺需要討論孫中山替中國建立的民族國家論述。1893 年冬，孫中山在廣州約集鄭士良等商討革命事宜時，初步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的民族主義綱領，認為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其咎在滿人」，所以把推翻滿人政權放在革命的首位，並「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56]，在興中會成立之後更明確說出：「一，集會眾以興中；二，振興中華；三，伸民志而扶國宗」的口號。[57]1905 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孫又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定為同盟會政治綱領，並在民報發刊詞中歸納為三民主義，如此他就把民族和政治、社會有機地結合起

---

53 戶川愛，〈一百年後讀「說茶」——對東西方的雙向啟示〉，《中華讀書報》，2003 年 4 月 9 日。
54 梁任公，〈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清議報》，光緒 27 年 9 月 11 日，頁總 5999。
55 如孫衛峰，〈論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 年；任浩，〈孫中山的大亞洲思想〉，《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李本義，〈論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江漢論壇》，2005 年。
56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57 孫中山，〈興中會章程〉，《孫中山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孫所形成的民族國家敘事早期有使國家分裂的傾向，但後來他轉為對於封建壓迫的反動[58]，力組一個屬於中國民族「至完美的國家」[59]。另一方面孫中山在日本受到宮崎滔天之影響，主張中日應該同盟，其基礎可分為二：一是以文明相同為論區分東西，二是以亞洲地域為主的「門羅主義」倡議中日聯合將西方勢力逐出亞洲，在這第二個基礎上，就必然要承認中國與日本即為兩民族國家，在相互承認的前提之下進行合作，故而反與亞洲原有的秩序切割。

「中國」這個概念或曰符號於是在他者與自我不斷地互構下於焉形成，被中國視為化外之地的思想家從亞洲開始認識從而把握中國的樣貌，將中國視為近代化的實驗品；而亞洲甚至中國自身的知識份子也在某種程度接受了西方認識論中的前提，進而對於中國近代化的認識變成為如何建立一個如德意志或是義大利民族一般的國家，因而阻絕了在固有文化脈絡上開展對中國可能的認識論。

參、中國可以是什麼？一個經濟史面向的探討

認識論在轉換上並非不可能[60]，惟涉及哲學層次之討論並非本文之目的，中國認識論如前述已經具備了某種擬科學的性質[61]，而這種性質對於掌握固有文化脈絡的變遷將產生困境，[6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依其中國經濟史研究，提出朝貢貿易體系理論，大可屬於擺脫民族國家預設的一次嘗試。

---

58 孫中山，《孫中山文粹》，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 155。
59 孫中山，《孫中山文粹》，頁 121。
60 事實上我們可以宣稱今日所有的認識論都是在經過轉換之後而來。參見 Kai Hahlweg, *Issues i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SUNY Press, 1989).
61 對於這種性質在今日已經有很多反思，如中國的孫偉平，台灣石之瑜等研究者皆有撰文。孫偉平，《事實與價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普遍價值：可能性及其限度〉，《天津社會科學》，第 1 期，2001 年；石之瑜，《政治學的知識脈絡》。
62 Wang Zhengyi, “Inherit or Transfer? A Dilemma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Reality”, Review, Vol. XXI, No.3 (1998), pp.327-3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濱下武志受教於日本中國經濟史學家西嶋定生，其研究以上海機器織布局為起點，探討以上海為出發點的中國乃至於亞洲現代化的問題[63]，其方法為透過第一手資料如銀行或海關等從而建立其中國對外金融與貿易的圖像。對濱下而言此類金融與貿易的問題意識通常帶有國家甚而中央對地方的前提，但其認識論卻主張應以地方對地方的概念出發以理解中國，在這個前提下濱下武志形成了其朝貢貿易體系論。

朝貢研究的淵源不短，1910 年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華夷秩序的原理探究中已將中國與朝貢國關係寫進其代表著作[64]。費正清的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一書首次處理朝貢體制中貿易與外交關係的作用[65]，該書出版後次年九月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辦有關東亞傳統國際秩序的研討會，邀請日本、韓國、台灣共十三位學者，會後並將論文彙編出籍[66]，費正清在序言中談到「中國人與其他周圍地區，以及與一般『非中國人』的關係，都帶有中國中心主義與中國優越的色彩，中國人往往認為，外交關係就是將中國國內體現於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同一原則的向外示範……我們寧可稱之為中國的世界秩序。以中國為中心的、層級制的中國外交關係。[67]」

從費氏的文本可以明確了解其西方（或是美國）中心的立場，但華夷秩序確實是論者在架構朝貢研究時不可或缺的前提[68]。濱下對於朝貢

---

63 此處指的即為濱下的博士論文。

64 馬士（Hose 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頁 55-56、696。

65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66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67 陶文釗編選，林海、符致興等譯，《費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54。

68 諸多海內外學者論及此處都發展出了自己的華夷秩序理論。張啟雄認為華夷二者構成中華世界，華為王畿而夷為藩屬，依此，華＋夷＝王畿＋藩屬＝中國＋諸王國＝中華世界帝國，張啟雄的概念發想於儒家的倫理觀，張並進一步把中華世界帝國中的倫理觀細分為十二項。參見張啟雄，〈「中華世界帝國」與琉球王國的地位——中西國際秩序原理的衝突〉，《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民 80，頁 424-425。何芳川則是通過考察古代華夷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係研究的貢獻在於突破既有對於歷史解釋中政治規範性的研究，轉以發展出一套足以規範並形成亞洲經濟的內在結構為研究目的[69]。1988 年 6 月，濱下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組「中國與東北亞關係」的研討會中發表了「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研究」，提出了對亞洲價值、亞洲秩序以及亞洲歷史上各種地域模式（如海域模式、網絡模式等）等看法[70]，此後濱下又發表一系列論文與專書以進行補充。濱下認為在亞洲內部長期以來存在著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獨立朝貢貿易體系，近代亞洲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此體系制約，對濱下而言，亞洲的近代化是以對朝貢關係處理的內容來決定，而不是西洋化取代的程度來決定[71]。濱下否認亞洲的近代化始於十九世紀中葉，反對亞洲近代化是以英國產業資本為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對亞洲之衝擊，或從而打開亞洲市場的傳統論述。他認為亞洲的發展有其內在邏輯，西方之衝擊至多只是提供某種外生因素的契機，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在其研究中並非由政治學中的民族國家所組成[72]，而是一種如孫歌所言「主體彌散的空間[73]」。

序從醞釀、形成、充實到衰亡的歷程中，指出華夷秩序是「自漢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國際關係格局中發展的最完整」的「以中華帝國為核心的古代類型的國際關係體系」。參見何芳川，〈「華夷秩序論」〉，《北京大學學報》，第 6 期，1998 年。王正毅在受教於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後，也援引了世界體系論進而分析了古代中國與東亞的華夷關係。參見王正毅，《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白永瑞對華夷關係的認識則在於中國將自我視為世界中心的自民族中心主義，以文明的程度來確定彼此的地位差別，從而形成位階秩序的文明圈。可是，由於周邊國家和民族也可以接受這一文明的標準，因而具有文化普遍主義的外形。白永瑞教授於 2006 年 4 月 27 日曾到台灣大學政治系以「東亞地域秩序－從帝國至共同體」為題演講，參見 www.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 /EastAsianOrder (Taiwan).pdf，頁 2。

69 濱下並沒有放棄華夷秩序的假設，他除了吸收了費正清的同心圓理論之外，亦發展出自己的同心圓理論。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7。

70 濱下武志，《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系列演講之一，2000 年 6 月。

71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32。

72 王作成，〈亞洲本土學者對亞洲史重構研究的探索——以濱下武志、王正毅為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 1 期，頁 42-47。

73 孫歌，《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濱下朝貢體系的根本認識，在於它是以商業貿易行為進行的活動，形成以朝貢貿易關係為基礎的貿易網絡[74]。這種網絡具有多重結構的性質，即通過進貢——回賜的方式，中國、日本與越南等關係較緊密的周邊國家間形成了核心貿易網絡，而各朝貢國間又有錯縱複雜的貿易關係，如日本、暹羅、朝鮮間各有平等的貿易關係。另外，日本、越南等國又要求琉球、南掌等小國向自己進貢，形成次級朝貢貿易體系，在此體系的邊緣地帶，又與以印度為中心的貿易圈，以伊斯蘭世界為中心的貿易圈發生關係，構成一個將亞洲連為一體的貿易網絡，濱下認為此體系確定了亞洲的近代發展，而亦代表政治上把中國的國內管理體系適用到東亞與東南亞地區[75]。

在這個知識的基礎上，濱下武志進一步從中國出發進行其對於周邊海洋區域的研究，濱下把海洋世界的活動視為動態而非靜止，並認為超脫土地概念的研究可以涵蓋更多的地區與呈現不同的內容[76]。大體而言，濱下將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黃海、東海、南海、蘇祿海、爪哇海、印度洋、西里伯海、阿拉福拉海、珊瑚海、塔斯曼海等連結起來[77]。對濱下來說，中國作為秩序的中心如何形塑地區規範並非首要，而且透過諸多事件史分析中國已經被堆砌為具有空間範圍及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以現代性敘事檢視過去所得之文本雖然可反映現實，但卻也無法完全作為再現。因此在其文本中，濱下強調海洋與海洋、海洋與島嶼、港口與港口間之關係，尤其在華南研究中又特別強調香港的中介港口作

[74]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頁 32。
[75] Takeshi Hamashita, "Tribute and Treaties: East Asian Treaty Ports Networks in the Era of Negotiation, 1834-1894," trans. Adam Schneider.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 No.1 (2002), pp.59-87.
[76] Takeshi Hamashita, "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Coastal Urban City Networks in East China Sea Zone: From Pusan-nagasaki-Ryukyu-Southeast Asia Channel to Yichon-Shanghai-Kobe Channel," http://ucrc.lit.osaka-cu.ac.jp/200603sympo/20060319pdf/hamashita_e.pdf；濱下武志，《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研究》，頁 15。
[77] 濱下曾把其海域模式描繪成圖。參見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New Yor: Routledge, 2003), p.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78]香港的多元文化特徵及加上移民與華僑等所形成的網絡模式研究，亦挑戰了傳統政治史與政治科學對於香港殖民地位之研究議程[79]。

簡言之，濱下武志對中國的認識論接續其對亞洲的理解。首先，濱下並不認同歐洲勢力「侵入」亞洲，此點即為對於衝擊——反應論的反思，歐洲力量並沒有滲入亞洲內部，而是透過由華僑、印僑等已經構築完成的貿易網絡從而擴張其勢力，因此歐洲是根據其擅長的金融、貿易面向進入亞洲內部，但並沒有創造新的環境，而僅是利用原有的秩序而已[80]。因此伴隨著前述的思想，濱下武志便主張為了確實反應亞洲內部的問題，「必須要從亞洲內部的歷史架構去討論亞洲的近代化問題[81]」，在他的策略裡，中國問題也被解構，不再是近代化問題中的民族國家假設，其方法也脫離國族建構的前提，而追求外於國家的問題意識，著重探討移民、對外關係及華僑等。中國在其敘事中並不是一個由北京政府所領轄的四萬萬人民「國家」，而是一種代表了原生的亞洲網絡體系[82]。

肆、結論：觀察中國的新角度

透過濱下對於中國研究的另一種知識述評，政治科學以民族國家為對象探討中國現代化，就不啻為一種具有目的性的政治主張，因而不可避免是一種建構現實的政治敘事[83]。

---

78 由於濱下的推動，1997 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成立「華南資料研究中心」。該中心網址 http://home.ust.hk/~scenter/chinese/index.html。

79 濱下從香港之八大腹地開始逐次討論到移民、華僑、僑匯所構成的香港網絡中心地位，並從此基礎上檢視當時一國兩制的爭議與可行性。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亞洲網路中心》，臺北市，牛頓，民 86。

80 Takeshi Hamashita,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 (1988), 7-25.

81 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亞洲網路中心》，頁 14-15。

82 濱下幾乎主張任何亞洲的近代史都必須由朝貢關係中掌握，例如在討論到日本的近代化時，濱下認為中日之間西化的速度快慢——也就是放在開國/工業化的脈絡下觀察——必須留意中國商業對日本的障礙。

83 這不禁使人想到除了 Harding 以外，另一位女性主義的大家 Donna Haraway。後者與前者的立場論不同，其思想是高度相對主義的後現代觀，連 Harding 都曾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學隨著社會科學典範的不斷轉換已然成為一門科學，本文寫作的動機正如同費若本（Paul Karl Feyerabend）在其著作中所宣稱的：「旨在使人們免受（科學）哲學的困擾，免受諸如『真理』、『實存』或『客觀性』等抽象觀念的支配，因為這些觀念限制了人們的視域和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84]」。為了進入這些抽象觀念，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必須站在特定發聲位置，逐漸塑造成今日中國研究的前提。固然不必否認民族國家的實踐，但超越政治科學的中國認識，是回應當前中國研究對固有文化脈絡的難以掌握所必須。面對將中國化約成歐洲式民族國家的區域研究，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研究提醒論者可以用一種開闊且富有創造力的智能來進行中國研究[85]。

濱下武志的貢獻在於模糊了中國的民族國家身分，突破經驗論處理以民族國家身分壟斷中國研究的問題，他試圖構築出另外一種流動的中國概念，中國因而是一種倫理秩序而非主權國家，其觀念帶給中國研究者一種新的角度。並賦予中國一個新的發聲位置。論者在從事研究工作的目的為如何使中國研究更為進步，身為科學頑童的費若本在討論到古代原子論、哥白尼革命、現代原子論等進步的背後，都是因為從事研究工作者沒有受到許多前提所加諸束縛，對政治科學中從事中國研究的人而言，費氏的話亦可受用：

> 唯一不會阻礙進步的原則就是：什麼都可以（anything goes）[86]。

度撰文「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認為 Haraway 的過度相對主義是不可取的。不過其觀念仍可對政治學帶來某種反思的作用，如主張任何政治身分還是作為認識的主體都是衝突、偏狹、策略性的，個體與立場之間也沒有固定的對應。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84 Paul Feyerabend, *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Feyerabe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179-181.

85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NBL , 1975), p.307.

86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 p.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中文專書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市：時報文化。

Mark Cousins 著，嚴鋒譯（1997）《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王爾敏（1976）《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

王正毅（2000）《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石之瑜（2001）《政治學的知識脈絡》。臺北市：五南。

呂理州（1993）《改造日本的　蒙大師：福澤諭吉傳》。臺北市：遠流。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等譯（1997）《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

岡倉天心著，張喚民譯（2003）《說茶》。天津：百花文藝。

施堅雅著，史建雲、徐秀麗譯（1998）《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施堅雅編，葉光庭等譯（2000）《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

孫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臺北：巨流。

孫歌（2002）《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孫偉平（2000）《事實與價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孫中山（1982）《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

孫中山（1996）《孫中山文粹》。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馬士（Hose Morse）著，張匯文等譯（2000）《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北京：三聯書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光興（2006）《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台灣社會研究書系。
陶文釗編選，林海、符致興等譯（1991）《費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1999）《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黑格爾等著，何兆武、柳卸林主編（2001）《中國印象——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輯社譯（1959）《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霍布斯邦著，李金梅譯（1997）《民族與民族主義》。臺北：麥田出版。
濱下武志（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濱下武志（2000）《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
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1997）《香港大視野：亞洲網路中心》。臺北市：牛頓。

中文論文

王作成（2004）〈亞洲本土學者對亞洲史重構研究的探索——以濱下武志、王正毅為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方維規（2002）〈論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與「中國」〉，《二十一世紀》，總第 3 期。
戶川愛（2003）〈一百年後讀「說茶」——對東西方的雙向啟示〉，《中華讀書報》。
石之瑜（2006）〈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4 期。
石之瑜（2006）〈知識觀光：中國研究的知識倫理框架〉，《社會科學》，第 2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浩（2005）〈孫中山的大亞洲思想〉，《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李本義（2005）〈論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江漢論壇》。
何芳川（1998）〈「華夷秩序論」〉，《北京大學學報》，第 6 期。
邱澎生（2004）〈如何審視鏡像中國？評介「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台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
哈定（Sandra Harding）著，江珍賢譯（1992）〈女性主義、科學與反啟蒙批評〉，《島嶼邊緣》，第二期。
馬場公彥著，石井剛譯（2004）〈後冷戰時期「東亞」論述的視域——走向開放性區域主義的幾個嘗試〉，《開放時代》。
許介鱗（2003）〈福澤諭吉的文明觀與脫亞論〉，《歷史月刊》。
許紀霖（2005）〈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現代中國兩種民族國家認同觀〉，發表於「現代性之政治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孫衛峰（2006）〈論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孫偉平（2001）〈普遍價值：可能性及其限度〉，《天津社會科學》，第 1 期。
陳宏銘（2003）〈現實主義典範的進步或退化：以 Vasquez 採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的論戰為焦點〉，《東吳政治學報》，第 17 期。
張啟雄（1991）〈「中華世界帝國」與琉球王國的地位——中西國際秩序原理的衝突〉，《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葛兆光（2002）〈想像的還是實際的：誰認同亞洲？〉，《台大歷史學報》，第 30 期。

日文專書

矢野仁一（1923）《近代支那論》。東京：弘文堂書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竹內好著（1993）《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
岡倉天心（1939）《東洋の理想》。東京：創元社。
樽井藤吉（1975）《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若月書店。

日文論文

石之瑜（2006）〈アヅアに戻るのか？日本の中国勃興認識における思想的基礎〉，佐藤東洋士、李恩民編，《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可能性——日中関係の再検討》。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英文專書

Arrighi, Giovann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Bodin, Jean. *On sovereignty: four chapters from six books on the commonwealth,*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lian H. Frankl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hen, Paul.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Davis, Richard L.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42(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Doyle, Phyllis.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nzhari, Y. *The Descent of Icaru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airbank, John King.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Fairbank, John King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Feyerabend, Paul. *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Feyerabe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Feyerabend, Paul. *Against Method* (London: NBL, 1975).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Gordon, Scott. *Controlling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Hahlweg, Kai. *Issues i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SUNY Press, 1989).

Haraway, Donna.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Hetherington, Stephen Cade. *Epistemology's Paradox: Is a Theory of Knowledge Possibl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1991).

Hymes, Robert P.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Mattingly, Garrett. *Renaissance Diplomacy* (Dover Publications, 1988).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opper, Karl.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ince, G. *Narratology* (Berlin: Mouton, 1982).

Ricoeur, P.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 by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Sabine, George Hollan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1).

Smith, Anthony D. *The antiquity of nation*s (Malden, MA, USA: Polity, 2004).

英文論文

Bhabha, Homi.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October*, Vol. 28, Discipleship: A Special Issue on Psychoanalysis (Spring, 1984).

Bol, Peter.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ion in Southern Song Statecraft", presented for Program for the Academia Sinica'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2000/6/29-7/1).

Bruner, J.S.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1), pp.11-32.

Connolly, William E. "Tocqueville, Territory and Violenc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I I* (1994), pp.19-42.

Glahn, Richard Von. "Municipal Reform and Urban Social Conflict in Late Ming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2 (1991).

Hamashita, Takeshi, "Tribute and Treaties: East Asian Treaty Ports Networks in the Era of Negotiation, 1834-1894," trans. Adam Schneider.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 No.1 (2002).

Hamashita, Takeshi. "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Coastal Urban City Networks in East China Sea Zone: From Pusan-nagasaki-Ryukyu-Southeast Asia Channel to Yichon-Shanghai-Kobe Channel," http:// ucrc.lit.osaka-cu.ac.jp /200603sympo /20060319pdf/hamashita_e.pd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mashita, Takeshi.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 (1988).

Hartsock, Nancy C. M.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andra Harding ed., *Feminism &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rtwell, Robert.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 pp.365-442.

Shenhav, Shaul R. “Thin and Thick Narrative Analysis,” *Narrative Inquiry* 15(1) (2005).

White, Hayden.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J.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Widdershoven, G.A.M. “ The Story of Life: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Social Research* 54 (1).

Zhengyi, Wang. “Inherit or Transfer? A Dilemma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Reality”, *Review*, Vol. XXI, No.3 (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eyond the Nation-state: Hamashita Takeshi's Epistemological Lesson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Wei-Zhi Chen

Abstract

When so-called China Study is being conducted, the first thing ever comes into consideration ought to be whether "China" is a nation-state or not. It seems self-evident in political science nowadays because we all act on the premise that has been affirmed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Westphalian System. All fields of China study root in the same hypothesis which is statism. This essay does not tend to resolve the assumption which has still been taken by most IR theorists but to present another possible epistemology when facing China and to question the idea of applying oneness when researching.

Keywords: China, Epistemology, narrative, political reality, tributary trade syste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